

何占豪



何占豪，1933年8月出生于诸暨何佳山村。幼时热爱音乐，后考入浙江省文工团当演员。

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，在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。

1959年与同学陈钢合作创作了基于越剧音调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后，从此成为中国乐坛上的著名人物之一。

继《梁祝》之后，又创作了《烈士日记》、《决不要忘记过去》、《龙华塔》、《别亦难》、《草原女民兵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一大批音乐作品。

称何占豪是“音乐奇才”一点都不过分。他在音乐的海洋里遨游虽说是因《梁祝》成名，但主要还是个农村娃娃时就在襁褓中跟着奶奶学唱儿歌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我们诸暨，我小的时候盛行是二种戏，一种是越剧，一种是绍兴大板。我爸爸懂得一些绍兴大板。因此，小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些长辈唱些家乡戏，主要还是我奶奶，我奶奶是越剧迷。我的任务就是给我奶奶背凳子。每逢过年就背凳子到戏院里去放好，奶奶领着我去看戏，我就从小受家乡音乐的熏陶。第二，我小的时候就是抗日战争时候，我的姑妈们在高级小学里念书，回来之后，唱很多抗日歌曲，我觉得非常好听，所以又受到了这些新的音乐的熏陶。这些音乐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在我脑子里生根了。这样就慢慢爱好音乐，直到自己读书的时候，对音乐特别喜欢。

杭州解放那一年，何占豪才17岁，考入了浙江省文工团。他唱歌、跳舞、演戏，样样都在行。1952年，何占豪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，在这里，他开始学习小提琴。为了能尽快提高技艺，他特意在星期天早早赶到上海寻师学艺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我当时考到音乐学院来实际上是来学习小提琴的，希望学成之后回到浙江去，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当时，我们学习的都是外国曲子，总觉得学的这些练习曲、乐曲也好，与我们家乡戏曲这味道总是格格不入。（我们觉得）我们自己应该把（小提琴拉中国曲子）这一职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。所以，我们虽然拉小提琴，但我们自己还是要创作，要学会创作。我从音乐学院进来之后，由于小提琴改革民族化的需要，才开始学习创作的。

1957年，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。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“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”，探讨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由小提琴来拉《二泉映月》我们是第一批，也许我灌的唱片是第一张。我们一拉之后，他们喜欢，他们能听懂。所以，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用小提琴拉民间音乐、拉戏曲使老百姓能听懂，他们喜欢了，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了。

1959年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走上舞台，奏响了中华民族化交响音乐具有世纪意义的礼赞。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，其唱片的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。国人称它是“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”。那年，何占豪和陈钢这二位作者的年龄分别为26岁和24岁，他们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。谈及《梁祝》的创作经过，何占豪娓娓道来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《梁祝》这个题材，虽然当时我已经做过试验，我曾经用越剧的曲调写过一个四重奏，用四个人拉的小《梁祝》。（当时）文化部的一个官员来我们学校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党委书记、作曲家孟波先生推荐给他听，听了之后，他觉得那个时候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乐还没有这个先例，他希望我们探索下去。

我们除了大炼钢铁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之后，又补充了一个，是不是可以在小《梁祝》的基础上写个大《梁祝》。三个题材送上去之后，我们党委书记孟波同志毫不犹豫地第三个题材，就是我们认为并不很重要的（《梁祝》上）勾了一勾，（他说）你们就写这个吧！所以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领导是很重要的。

永和九年歲在癸卯
子晉書山陰之蘭

四十多年来，何占豪始终不渝地沿着民族民间音乐渗入骨髓，只要人民需要，他就创作。他的作品均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，刻划入微的音乐形象，浓郁的民族风格，震撼人心的戏剧性与抒情性，吸引着国内外不同层次、不同口味的广大观众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音乐人，对中华民族的音乐应该有所研究，应该有所贡献。比如，二胡、琵琶呀，为什么不能象小提琴和钢琴一样，成为一种世界人民喜欢的乐器。所以，八十年代以后，我致力于民族器乐的交响化，我写了很多二胡协奏曲、古筝协奏曲，二胡协奏曲不但跟民族乐队协作，而且跟西洋交响乐队协作，使我们这些演奏家拿一把二胡就可以走遍天下。

何占豪在搞好创作的同时，还积极培养作曲、演奏人才。他对后辈的提携是圈内人众所周知的。他常常告诫自己：音乐事业要象接力棒一样，一棒接一棒地传下去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青年演奏家特别需要作曲家为他们写曲子。比如，世界著名的有一个叫许可，许可就是现在日本都很红的二胡演奏家。她就是第一个演我写的《莫愁女》而成功的。现在象上海的马晓晖，也是我把她去招来，然后找人把她带到了香港，拉我的《别亦难》、《莫愁女》等，使她在国内外也有相当的知名度。

何占豪在五线谱中爬行，慢慢地又爬进了流行歌曲，八十年代末那首在大陆颇为风靡的《相见时难别亦难》，歌是香港红歌星徐小凤唱的，曲可是何占豪写的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人家给我取名叫“多功能作曲家”，因为我（作曲）路子比较广。西洋交响乐我也写，民族器乐我也写，戏曲我也写，流行歌曲我也写。《相见时难别亦难》也都不知道是我写的，以为是徐小凤写的。

何占豪的创作既有“高雅音乐”，也有“流行音乐”，用他的话来说，“只要文化市场需要，我就生产”。因此，他在圈内总是以高产、稳产、效益好为同行所羡慕，他的作品很受欢迎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我创作的特点，突出一个“情”字，感情的“情”字。我认为我的作品分二类：“情”一类，就是这个爱国情。另一类儿女情。正因为我《梁祝》出名，人家曾经把我认为是专门写爱情题材的专家。到香港访问我，我就这样讲，就是我的出生，从小受到的教育，促使我现在还有戏。第二个儿女情，那么这个也算，因为人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没有爱情就没有艺术。在艺术里边都包括爱情，这是人们永恒的主题。

何占豪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座右铭，那就是“外来形式民族化，民族音乐现代化”。他作曲生涯四十余年的全部作品，前二十年主要是以“外来形式民族化”为主。八十年代以后，何占豪又把“民族音乐现代化”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，除了将《梁祝》改编成高胡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外，还写了二胡协奏曲《乱世情》、民族管弦乐《伊犁河畔》、古筝协奏曲《孔雀东南飞》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。

（何占豪同期声）民族音乐需要提高，必须要看到外国近代的音乐方面的先进技巧。要使中国音乐向外国学习，而且又要得到提高，要得到老百姓的喜欢，就必须外来形式民族化。那句民族音乐现代化呢？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个民族历史非常悠久的（国家）。那么要使我们的民族音乐适应现代化，反映现代人的感情，那必须现代化。所以，我觉得民族音乐如果不现代化，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种没落阶段。

在结束采访前，何占豪表示，探索是他永恒的主题，只要人民大众喜欢的，他就会一如既往地创作。

 关闭